

人口与发展论坛

开拓 创新 规范 发展

——《人口研究》创刊 30 周年纪念

《人口研究》编辑部

主持人:陈 卫

背景

《人口研究》是中国最早创办的人口学学术刊物,自 1977 年创刊以来它已经走过了 30 年历程。在人口学上,按照目前中国的平均世代间隔,30 年也就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然而,就是在这短暂的一代人时间,中国经历了最迅速的经济发展和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的人口学和人口研究也迅速成长起来。

现在的《人口研究》和 30 年前时相比有了很大不同。浏览《人口研究》30 年的历程,记忆中的许多往事使人感慨、动人情怀。《人口研究》见证和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人人口学的发展。《人口研究》到了而立之年,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回顾《人口研究》30 年,从发表论文的选题、内容和数量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中国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的发展历程。概括起来,至少可以有以下一些变化:

第一,人口研究的领域有了巨大扩展。创刊初期的《人口研究》,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探讨和论证中国控制人口的必要性、重要性。但是在 1980 年代《人口研究》发表论文的选题就迅速扩张到人口学及各分支学科的研究。1990 年代以来,对人口变量(demographic variables)的研究不断深入,对人口变量与社会经济变量关系的研究不断增多;形式人口学(formal demography)的研究在深化,社会人口学(social demography)的研究在增广。现在的《人口研究》既是不失鲜明专业特色的人口学刊物,又是在更广范围的具有综合性强、涵盖面广、信息量大的社会学科刊物。

第二,人口研究的方法有了巨大变化。人口研究的方法与研究的内容及工具密切相关。形式人口学和数理人口学构成了人口学研究的独特方法,它也是人口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基础与标志。1980 年代随着我国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的开展,各种人口分析技术和人口模型被广泛应用到人口研究中,为考察和认识我国的人口变化,尤其是生育率转变起到了很大作用。1990 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和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发展,我国的人口研究逐步由宏观、汇总数据分析深入到微观、个人数据的分析。现在《人口研究》发表的文章主要都是定量研究,而定量研究的发展与深化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第三,人口研究的队伍有了巨大发展。从《人口研究》发表论文的作者就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1980 年代初我国人口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在联合国的资助下,国内两代人口学家通过出国留学或出国考察访问,了解国际人口学界的最新动态,学习和掌握现代人口学理论与方法,推动了我国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的迅速发展。同时,1979 年以来,中国自己培养的人口学本科、硕士、博

士、博士后人才已达约 3000 人。中国专门人口科研机构就有 70 多个,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成熟。30 年来《人口研究》的作者的扩大和变化也反映了人口学者的代际更替。

第四,人口学的交叉、合作研究越来越明显。随着人口研究的深入,人口学越来越需要借用别的学科的知识。同时,人口学知识也被广泛应用到别的学科领域的研究和活动中。人口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长期性,需要人口学者与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的合作、学术研究人员与实际工作者的合作、国内学者与国际学者的合作。学术研究的分工、合作体现在《人口研究》发表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日益广泛多样、受政府或国际机构资助的研究日益增多、多个作者合作的论文日益增多。1990 年代以来两个及以上作者合作的论文迅速增长,四五个甚至更多作者合作的论文也为数不少。

第五,人口研究始终围绕我国人口与发展的重大问题,面向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伟大实践。中国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人口活动实践的需要。人口学的应用性和政策取向是我国人口研究的鲜明特色。《人口研究》一方面引导和推动人口工作者研究和回答我国现实的人口问题;另一方面又组织讨论我国人口与发展的热点问题。自 1996 年以来《人口研究》创办的“人口与发展论坛”记录了《人口研究》对我国人口重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热点与前沿问题的探讨。

《人口研究》的 30 年是记录我国人口研究和计划生育实践探索、创新、发展的 30 年。值此创刊 30 周年之际,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教授从他们的经历和研究出发,回顾《人口研究》和我国人口研究的发展,总结他们的研究心得,提出对《人口研究》和我国人口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在新的历史起点为繁荣发展我国人口学做出新贡献 ——对《人口研究》而立之年的一点希望

郭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研究》杂志名誉主编)

1 中国人口活动的实践催生《人口研究》

在历史上中国从来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今天仍占全球人口的 1/5,按理在解决人口问题上和在人口科学上,中国应该对于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都在高度关注人口问题的时刻,甚至在组建联合国时的六大委员会中就设有一个人口委员会,联合国早期的秘书长长期把人口列为世界三 P(人口(Population)、贫困(Poverty)、污染(Pollution))难题之首,但遗憾的是,此时我国人口问题的研究和人口学却都是命途多舛。在 1950 年代曾经一度兴起的人口问题的学术讨论又被当时“左”倾错误把本来是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批判,一大批社会学家被划成右派,其后像马寅初《新人口论》主张的中国要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观点也受到铺天盖地的批判。人口问题在 1959 年后实际上已成为学术上的“禁区”,没有学者敢问津。另一方面,社会学、人口学和心理学等在 1950 年代的课程改革中是被取消的学科。在这个时期,人口学既无学校讲授也没有人敢于研究和探索,这就使得中国人口学同当时西方国家蓬勃发展的人口研究和教学形成很大的反差。

科学产生于实践的需要。我国人口众多的突出国情和我国上世纪 50~60 年代形成的两个人口高峰,对其后果当时却缺乏理论上的认识,一直到 1970 年代人口迅速增长到 8 亿多,中国又面临第三个更大的人口高峰时,才认识到“人口非控制不可”,中国才开始在城乡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恰逢其时,1971 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国际上一个又一个人口问题的地区会议和 1974 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大会,讨论世界人口增长和各国人口政策问题。为此国家有关部门从人民大学抽调一大批教师到当时的国家计委从事人口研究工作和文件起草工作。1974 年国际人口会议后,当时的国务院文教办、中共北京市委和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三家联合建议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工作班子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常设的人口研究机构。机构 1974 年成立并开始工作,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前身,是《人口研究》的始创单位和主办单位。在人口机构成立之初,人口所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论证中国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宣传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探索人口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世界各国人口问题和旧中国人口问题等,通过比较、加深认识,把初步研究成果带到各地宣传、散发。实践证明,中国幅员这样辽阔,人口众多,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推行计划生育最重要的和最难的就是人口教育,把中国控制人口的必要性、紧迫性宣传到各级干部和育龄群众,做到家喻户晓。大家都认识到,开展人口教育和计划生育必须有专业报刊的支持。当时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学者们很早就萌生要办一个人口刊物来交换学术观点和对干部、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得到当时全国计生办的大力支持,中国人口学界的第一本杂志《人口研究》正式创刊。在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在联合国资助下组成第一个人口学出国考察团,访问美国《人口索引》、《人口学》,英国《人口研究》,法国《人口》四大人口杂志后感到有必要将《人口研究》杂志向社会公开,1980年正式公开发刊。《人口研究》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今天已成为中国期刊方阵、中国人口学会会刊、CSSCI来源刊物和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证明实践推动理论发展。《人口研究》今天到了而立之年,倍感责任重大。

2 《人口研究》在繁荣发展我国人口学与时俱进

《人口研究》诞生时正是我国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阶段,是我国逐渐形成一条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最大的特色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是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新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育率迅速下降都是举世瞩目甚至可以相提并论的。在这个时期又是我国社会矛盾和人口问题最多、最突显、最集中的时期。总人口和亚人口的数量、结构、质量、迁移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人口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问题有如潮涌。另一方面,在人口学繁荣了一个时期后,人口学繁荣又曾一度被视为“昙花一现”,风光不再。但《人口研究》始终坚信人口学是一门不可替代的、独立的社会科学,始终坚持初衷把繁荣人口学看成是责无旁贷的。30年来在如何繁荣发展人口学上,《人口研究》一直在多方面探索,举要如下:

(1)《人口研究》始终坚信,人口发展是有规律的,违反规律要受到惩罚的。人口学是人类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人口学一时的兴衰不影响总的发展趋势。在人口学发展低微的时刻,《人口研究》配合人口研究所召开“21世纪人口科学研讨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学术讨论会”,发表了大量文章论证人口学在21世纪是一门朝阳学科。也发表了增刊,论证在人口、资源、环境在人类发展关系中,人口始终处于关键地位。《人口研究》诸多论文、文章凝聚和团结了当时老中青三代人口学者,共同为繁荣发展人口学而努力。

(2)30年来《人口研究》始终不渝地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人口学的指导思想,以保证人口学繁荣与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人口研究》创刊时,恰逢粉碎“四人帮”后《毛泽东选集》第五版出版,《人口研究》迅速组织力量研读这本著作,编写毛主席关于人口理论和计划生育语录作为创刊的首篇。在公开出版后大量刊登关于“两种生产”和其他有关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讨论文章。在30年间《人口研究》发表了许多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关于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关系研究的成果。

(3)《人口研究》从创刊时就认为人口学是一门独立科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这就是人口学的各个变量,既研究总人口也研究各个亚人口的变量,同时要研究人口变量和非人口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人口学有自己广阔的研究空间。在30年间,由于控制人口的需要,发表的论文除了较大量发表关于生育研究外,始终未忽视对死亡、迁移、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分布和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随着继续研究稳定低生育水平外,更多关注人口迁移和人口老龄化,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

关系的研究成果等方面的重大课题研究,特别是发表相当数量有关女性人口、老年人口、流动人口、农民工和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亚人口的研究。事实证明从人口变量的独特视角研究亚人口是人口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和内容,在中国也是最有广阔前途的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亚人口必将成为以人为本和关注民生的聚焦点。

(4)《人口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人口学是一门数量科学这个特点。在社会科学中很少有一门科学能像人口学、统计学那样用大量数据说话,又有一套自己特有的科学的收集数据资料体系和分析指标体系等技术方法。又由于研究人口现象用独有的人口普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生命统计,并大量运用各种形式的调查研究,使得所有人口变量研究做出的结论都立足于数据(事实)的基础上。30年来我们大量刊登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和各次生育率调查、迁移调查、老年人调查、儿童调查和残疾人调查的整理资料以及数据分析报告和人口预测,许多数据成为各部门和学者研究的重要依据,体现出人口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不可替代性。《人口研究》经常摘登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的研究成果和结论。

(5)基于人口学是数量科学的特点,《人口研究》十分重视用人口数据对各种理论观点和一些命题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做出证实或证伪。例如对我国上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需要证实,《人口研究》曾不遗余力用过大量篇幅,邀请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求真务实。另一方面,对一个时期社会上媒体“热炒”知识分子的寿命问题,认为由于工作压力大,知识分子大多英年早逝、寿命较短,这是个似是而非的命题,《人口研究》发表了一些学者经过利用人口普查资料、抽样调查和专门调查数据证明这是个伪科学的结论,相反在人群中知识分子是寿命较长的,以正视听。这是人口学证实和证伪作用的生动体现。《人口研究》在探求真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6)《人口研究》在公开出版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在1981年“致读者”的信中明确提出《人口研究》将在学术上贯彻“双百”方针,30年来始终坚持这一方针,在形式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在1980年代开展“两种生产”和“人口规律”的讨论,把对计划生育的必要性的论证引向深入。在我国生育率下降后多次开展生育率的讨论和后人口转变的讨论,这些讨论吸引了广大学者参与。从1996年起,《人口研究》组织专门学术论坛作为学术讨论的平台,十多年来从未中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近年来每期开展的“人口与发展论坛”已经成为《人口研究》的一个品牌,吸引了许多学者参加讨论,对推进人口学的繁荣和提高人口学的学术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

(7)《人口研究》强调人口学是数量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特点,但绝不是把人口学作为只能提供人口数据的一项资料工作。同所有社会科学一样,人口学作为一门科学是要认识规律的,是要用来指导实践的,对科学决策提出智力支持,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人口研究》在今年陆续刊登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及其子课题的几个研究报告,发表这些报告旨在表明人口研究不仅有翔实可靠的数据,而且要做出理论上的概括。诸如提出改变中国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要优先投资于人等重要结论。《人口研究》推出这些集体长期认真研究的成果,就展示了人口学研究不能仅满足于复杂繁琐的数学推导,只见树木,不见树林,而需要做出言之成理,言之有据的理论分析的结论,体现人口学的科学价值。此外,《人口研究》一向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所以常常刊登一些来自实践部门工作经验总结的文章,这些文章许多本身就有理论价值,刊登这些文章是为了经验交流以便于做出进一步理论概括,形成对人口现象规律性的知识。

(8)《人口研究》从一开始就认为人口学有自己许多独特的研究方法,讨论这些方法是人口学研究课题应有之义,在《人口研究》一开始就探讨TFR、终身生育率以及有关人口普查和各种人口调查问题,一直没有中断,方法创新是人口学研究与时俱进的重要一环,今后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

《人口研究》虽然一直努力于促进人口学的发展,但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我们希望今后在中共十七

大的指引下,为推动人口学发挥思想库的作用。

3 《人口研究》而立之年要志存高远为繁荣中国人口学立新功

《人口研究》在人口学发展跌宕起伏中走到而立之年。这30年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最显著的成就是经济的高速发展,把我国从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拉回,并跃居世界前列。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在人类发展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里率先达到更替水平的一个。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就有责任在和平发展中除了关注中国各种各样人口问题外,也要关注全球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全球人口迁移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最近,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and 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句话对我国人口学的发展切中要害。作为繁荣发展人口学为宗旨的《人口研究》任重道远,今后要立志高远、开拓前进,为此我个人有以下三点建议:

(1) 今后在刊登论文、文章要进一步提高人口学的科学性和理论性

人口学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科学体系。虽然不是莫测高深,但绝不是靠自发冥思苦想就能无师自通的,有的自诩为人口学家的,在许多人口基本概念和计算方法上尚有模糊不清的。因此人口研究必须加强人口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同时必须引导人口学研究成果不断提高理论性和创新性,不停留在数字罗列和数学演算,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论证严密并能经得起实践考验,更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 《人口研究》要为培养人口学创新人才作出贡献

我国长期有一种重理轻文的倾向,在社会科学中,重经济轻社会,因此《人口研究》要大力帮助人口学创新人才成长,利用《人口研究》发现人才、扶掖人才,使我国人口学后继有人,在人才强国战略中人才辈出。

(3) 《人口研究》要有开放的国际视野

在人口学上中国要吸收国外一切有益的成果,《人口研究》必须刊登国际上人口学有益的文献和海外学者创新的研究成果,以利于解决人口学的各种难题。另一方面,也要有目的地介绍中国在应对稳定低生育水平下各种人口问题,诸如人口老龄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经验教训。通过对外发行的平台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外,体现出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国外开展交流。

综上所述,《人口研究》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为繁荣和发展我国人口学做出新的贡献。

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人口理论创新

桂世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教授)

我是在1976年起开始涉足人口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从1978年起先后参加了第一次~第八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人口研究》创刊30年来,我是它的最忠实读者之一。我喜欢看《人口研究》,也经常给研究生介绍和指导在《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中的一些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建议。

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多次使用“创新”一词,诸如“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改革创新”、“自主创新”、“创新人才”、“创新精神”等,要求“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回忆过去,我觉得《人口研究》最具“闪光点”并应在今后继续发扬光大的是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人口理论创新。

《人口研究》早在 1979 年第 1 期上,就发表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口学会首任会长许涤新的论文《有关人口理论的几个问题》。该文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及其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要做好计划生育工作,解决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存在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问题,“单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做好思想工作,特别要在经济方面,有着合理的措施。这都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努力”。在该年第 3 期上,又发表了我国人口学界前辈刘铮、邬沧萍、林富德合作的论文《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文章在论述解放后我国人口增长过快对国民经济带来很大困难和对我国人口发展前景几种估计的基础上,指出“现在比较切实可行的做法是:千方百计杜绝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和三个以上孩子(现在农村有 30%、城镇有 10%以上三胎),大力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并提出了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该论文的发表,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在 1980 年 9 月作出在今后三、四十年特别是二、三十年内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重大决策,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对于《人口研究》杂志积极支持理论创新的精神,笔者在 20 多年前就有切身体会。1981 年 1 月,我在提交给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毛泽东同志的人口思想初探》中,冲破了“凡是派”的禁区,运用大量资料指出了毛泽东同志的人口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曲折过程”,其中《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个别观点有片面性;他在 1958 年初讲的“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违反了 1957 年自己提出的“要提倡节育”的正确观点。会后查瑞传老师给我写信,在肯定“它是第一篇系统阐述毛泽东同志人口思想的文章”,“内容是有深度的,文字也是有水平的”,“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的同时,又向我解释由于当时党中央还未对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后的功过作出明确评价,因此该文未收入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集。1981 年 6 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明我的这篇论文符合中央决议精神,《人口研究》杂志编辑部立即写信给我,要在该年第 3 期上发表,并问我需作什么修改。我回信表示不作修改,并提出在发表文章的结尾注明是 1981 年 1 月完稿的。《人口研究》非常尊重我当时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意见,给我以很大的鼓励。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人口学界对影响我国生育率变化的因素展开了热烈讨论。当时《人口研究》发表了两篇有代表性的富有创见的论文。一篇是 1986 年第 3 期登载的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的论文《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该文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对生育率的影响,教育对生育率的影响,指出“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有复杂的影响,同一因素可能对生育率同时起刺激和抑制的作用,其影响是非线性的,在各个时期和各种不同条件下,其作用是不同的”。“在中国的现状下,人均收入和文化教育是对生育率影响最大的两项社会经济参数,婴儿死亡率、都市人口比例等参数作为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反映会起重要的作用”。并认为“人均收入较低时,收入增加在某些条件下反而会对生育率起刺激作用,只有收入增长到一定水平以上时,才对抑制生育显示明显的作用。这一水平约为 500~1000 元/人”。“文化教育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对抑制生育都有很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农村中,这一作用更加强烈。从全国来说,初中文化教育很重要,在这一阶段,每年的教育可使妇女生育减少约 0.2 名孩子,高中以上文化教育对进一步减少生育的作用减弱”。另一篇是 1987 年第 1 期登载的林富德老师的论文《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分析》。该文也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深入分析了经济因素、文化水平、城镇化程度、妇女从事的社会劳动性质、国家提倡计划生育、初婚年龄分布与次生育率的结构对我国生育率变动的的影响,并指出在我国影响生育率的经济、文化和城镇化程度等三个因素中,“影响生育的最强因素是文化程度,最弱因素是城镇化水平,处于中等影响程度的是经济因素”。而且在“我们业以查明生育率转变的主要因素”中,“上述三方面就能解释生育率总离势中的 53%”。作者在文章最

后还声明：“当然我们并未找出影响生育率的全部因素，其他尚待探索的原因中显然还包括一些难以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

1992年前，在我国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不少人口学者撰写的文章中往往不注意低出生率与低生育率的区别，把建国后第三次出生高峰称为“生育高峰”。为此，查瑞传教授专门撰写了论文《我国第三次出生高峰不是一次生育高峰》，并在《人口研究》1991年第3期上发表。该文指出：我国建国后第一次、第二次出生高峰时，因当时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都比较高，所以可同时称为“出生高峰”和“生育高峰”；而建国后第三次出生高峰的总和生育率均在3以下，所以“只能称之为出生高峰，不是生育高峰”。后来在查老师晚年接受《中国人口报》记者夏京京采访时说：“你可不要小看这一字之差啊。只有分清了这差别，我们才能对症下药，争取工作上的主动，所以说，理论研究不能有半点模糊啊”（《中国人口报》，1999年9月6日）！

针对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人们往往认为生育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生育的数量、生育的时间（包括初育年龄和生育孩子的间隔）等情况，《人口研究》1992年第6期发表了顾宝昌教授的论文《论生育和生育转变：数量、时间和性别》。该文首次提出了“生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兼有三个特征：即数量、时间和性别。换句话说，任何生育都是一定数量、一定时间和一定性别的生育。我们把它称为生育的‘三维性’”。作者认为考察生育转变应从这三个方面去考虑，而不应该只说成是一个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否“彻底实现了生育转变”，必须看它是否“实现从多生到少生，从早生到晚生，从性偏好到无性偏好的转变”。以后顾宝昌又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中，把生育的性别扩展为“生育的质量（性别、健康和智力）”，使其的生育转变“三维性”理论表述得更全面。

随着我国人口研究和计划生育工作中更广泛地使用“总和生育率”这个人口统计的指标，该指标的局限性和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为了使大家更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人口研究》2000年第5期发表了郭志刚教授的论文《总和生育率的内在缺陷及其改进》。该文指出：总和生育率的第一个缺陷是“对终身生育水平的背离”，而“这种背离产生的原因是婚育年龄的变化，或者说是对队列的年龄别生育模式的改变”。总和生育率的第二个缺陷是“不能控制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即“没有容纳育龄妇女的曾生孩子信息，也就不能控制曾生孩次这种结构影响”，在比较孩次结构差别较大的年份或地区之间的总和生育率时，不能区分其差异到底出于生育水平不同还是孩次结构不同。作者认为Bongaarts和Feeney在1998年提出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是改进总和生育率第一个缺陷的较好方法；Feeney在1985年和马瀛通在1986年分别以不同思路创建的“孩次递进生育指标体系”，是改进总和生育率第二个缺陷的较好方法。

总之，上述几篇论文只是我感受较深的几个事例。《人口研究》创刊30年来发表了许多人口理论创新之作，它对繁荣发展中国人口科学和培育支持中青年人口学者成长所作的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国人口科学史册。

《人口研究》发展过程的启示

注：此标题本是“人口研究发展过程的启示”，但被编辑改错了。

郭志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中国计划生育经历了30多年风雨历程，中国人口研究也经历了恢复初创到繁荣的过程。两个过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实践。在这两个过程中，《人口研究》杂志在传播、交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恰逢《人口研究》正式创刊30周年，我作为长期从中受益的读者和作者，向《人口研究》杂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口研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这是一笔宝贵财富，非常值得人口学者不断加以

总结和汲取。借这次学术论坛,我想就中国人口研究、特别是生育研究方面,谈谈个人感想。

1 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和反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成为今天人口研究人员的共识。然而,在中国人口学发展的早期,人口研究也曾受到当时教条主义盛行的很大桎梏。那时,老一代人口学者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理论束缚下开始探索人口学规律、传播人口学知识的,并最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尽管今天的人口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当时的水平,我对老一代人口学者仍怀有深深的敬意,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是建立在他们奠定的学术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他们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追求真理的风范。

今天的研究条件比 30 年前有了极大的改进,研究领域更广阔,研究经费更充分,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先进,研究人员的自由度也更大了。但是,学风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做研究就需要学者自己把持自己,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作为中国人口学的后来者,我们应当将老一代人口学者的奉献精神 and 求真务实的风范传承下去。

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总是在一定局限条件下开展研究工作的,这种局限既包括外在研究条件的局限,也包括我们自身的认识局限。此外,还有来自社会方面的种种干扰和影响。所以,仅仅研究条件的改进并不能保证人口研究结论总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把握常常并不能一步到位,往往需要经历一些曲折。所以,我们很需要在科学实践中对中国人口的历史、当前状况、以及未来前景不断地加以反思、深化认识。力争使我们的认识尽可能地正确反映客观实际,进而形成恰当的决策和行动。

2 回顾生育研究及有关影响

1970 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使当时很高的生育水平大幅度迅速下降。这种成绩助长了对政府行政干预能力的迷信,而控制人口的迫切需要导致计划生育方面倾向于要求更严和急于求成。然而更强的行政干预并没有获得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反而引发了许多社会不良后果和相应的批评建议。1984 年进行了“开小口子”、调整生育政策。但是由于思想上并没有取得一致,行动上也欠步骤,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一些混乱和局部失控。与此相应,总和生育率在 2.5 左右徘徊。这种局面直到 1980 年代后期才逐步稳定下来。应当说,虽然我们现在拥有大量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历史文献和统计数据,然而无论是对 1970 年代生育率大幅下降还是对 1980 年代生育率上下徘徊,都尚未来得及进行深入的分析,许多认识至今尚不统一。但是,到了 1980 年代后期,政府和学者都开始认识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也要遵循客观规律,并且这里所说的规律决不仅仅是人口统计学规律。另外一点经验,就是做人口规划时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进入 1990 年代后,生育率又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再一次出乎人们的预料。1992 年全国生育率调查表明生育率首次直落更替水平以下,直接引发了对出生漏报问题的强烈质疑。然而,后来更多的调查结果反复表明,当时的生育率的确发生了大幅度下降,并且在整个 1990 年代中保持持续下降。

2000 年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仅有 1.23。尽管我们知道这一结果脱不了出生漏报的干系,但我们始终并不知道出生漏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学者们对 2000 年普查的人口总数与结构心存怀疑,而且对生育水平的看法差距很大。尽管主流观点认为 2000 年时总和生育率应该在 1.8 左右,我于本刊 2004 年第 2 期和第 4 期撰文提出,从 1990 年代调查揭示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和生育年龄提高的幅度来看,即便已经考虑了 18% 出生漏报影响,2000 年的总和生育率处于 1.5 以下的可能性很大。

鉴于种种条件限制,确切的生育水平一时半会的确较难搞清楚。也许,我个人对生育水平的估计过于乐观。但是,“统计”毕竟不是“会计”,并不需要准确到分毫不差,我们仍可能也需要对当前生育水平有大致把握,特别是对 1990 年代以来生育水平的大趋势要大致把握。因为这不仅仅是一般的学

术争论,而且关系到当前工作和未来规划。过去面对较高生育率,做人口规划时要加上一些余地,但这种就高不就低的工作习惯已经不适应今天的低生育水平。我的上述论文旨在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注意,不要忽视极低生育水平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人口规划中不仅要在较高生育一端加以保险,而且也要对较低生育的可能后果加以考虑。

时过境迁,我们又拥有了更新的调查数据。无论是2005年全国小普查、还是2006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查,统计结果都并未推翻上述我对2000年生育水平的观点。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估计中很可能对极低生育的前景考虑不足。

3 当前生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科学研究应当在一个较宽松的条件下进行,应当立足于大量观察资料的分析与综合,应当经过充分的学术交流与讨论。生育水平的人口统计研究也不例外。

在当前急速的社会变革中,中国人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从人口研究者的角度,需要不断地拓展视野、努力学习、认真研究。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思想局限会束缚自己的学术研究。

从前所述,30年来我们对生育前景的估计并不能很好地符合实际发展进程,正是因为我们对当时的生育状况及其形成原因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另一个例子是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研究。19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然而,这方面研究受到强大的行政干预,并没有充分开展起来。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出生性别比失调变得更严重,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者的密切关注,于是又涌现了相当一批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正逢1992年生育率调查后对出生漏报的强烈质疑,这种基本认识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研究。因此,1990年代的主流认识是将出生性别比失调主要归咎于出生女婴漏报。然而在2000年人口普查以后,更多的人开始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并不是假性统计问题,而是确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是,10年的耽误也使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又进而飙升到120的水平。

这些例子都表明,认识从现象到本质,除了受数据与分析方法的局限以外,还会受很多其他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影响。

生育水平统计是各种复杂因素导致的结果。有时,我们感到难以理解所得到的生育率统计结果,很可能是因为忽略了某些重要解释因素的存在。当总和生育率很低时,既可能由于出生漏报,也不能排除终身生育水平的确在降低,还有可能是因为婚育年龄推迟而产生了生育空档(专业术语称之为“进度效应”)。当总和生育率突然大幅回升时,可能是计划生育工作失控,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产生了出生堆积,甚至有可能是调查样本偏差所致。在研究工作中,个人经验和主流认识固然十分重要,但是也要时时重新审视和反思,不然研究工作同样会出现日常生活中常有的心理学选择现象,即“不想看的时候就会看不见”。科学研究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实践活动,目的不明确的研究当然就容易劳而无功。

科学发展史中能够清楚地看到新老研究范式的更替。所谓研究范式就是一种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体系。在科学发展中,当一种范式适合于所处的发展阶段时,它就会有力度地促进科学发展。但是当科学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时,原有范式就会落伍,反而成为科学发展的桎梏,新的范式就会应运而生。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观点与方法与时俱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仅要努力,而且要不定期地自我检讨、自我反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跟上历史发展。

为了推进生育研究,就要认真思考,拓宽视野。否则,就会在研究中先入为主地忽略了一些重要方面。同时,还需要努力学习和掌握新的分析方法。在统计分析中,所有的指标和模型其实都服务于展示事物的不同侧面,它们就是解决过河问题的桥和船,不掌握它们就很难过河。对于不同指标和不同模型结果,我们必须下气力正确地理解其意义,否则就会出现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混乱。

近年来,我曾经用各种不同生育指标来研究生育水平,用以展示不同方面的影响。但是,我注意

到一些论文或研究报告将近年不同学者计算的不同生育率都列入表格进行概括,其中也包含我计算的递进生育率、去进度效应生育率。我需要说明,这些不同的生育指标表达的是不同的内容,虽然将它们之间相比有反映相对差别、突出某种因素影响的意义。但是,如果将这些指标值都作为当前生育水平的估计则很不妥当,是一种概念混淆。目前人口统计中仍然以 TFR 作为当前生育水平的概要指标,而不论是年龄递进生育率还是间隔递进生育率尚未得到普及应用,而去进度效应生育率则根本不是当前生育水平指标,而是根据当前生育情况反映出来的队列生育估计。特别需要指出,以上所说的这些不同生育指标都完全不承担修正出生漏报的功能,我应用这些生育指标的分析只是为了揭示,除出生漏报外还有很多原因会导致常规总和生育率很低。

关于当前生育水平存在着差别很大的多种估计,我相信这会随着学术交流和更多信息的取得和研究而逐步趋向一致,因为我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觉得还应该指出,民主集中制虽然是政治生活和实际工作当中的原则,然而科学研究却只服从实践检验真理这一终极法则。这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不能用于判断一种认识是否正确,而判断一种认识是否正确只能根据科学性原则,即论证逻辑(即方法和模型)是正确的,事实依据、假设和推论结果要符合客观实际。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经常根据对论证逻辑的检验来做接受或拒绝其结论的初始判断,这仅仅是因为论证逻辑检验的成本较低。然而,这完全不能取代客观实际对认识的检验。所以,就是当论证符合逻辑的条件下,假如事实依据或假设条件脱离了实际,所有在此基础上的推导和结论也就很难符合实际。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且,实践检验并不是一劳永逸,而是必须要反复进行的过程。这些都是认识论和多年实际人口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4 小结

综上所述,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经过研究人员认真钻研却产生错误结论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这是因为,有时我们所能利用的数据是有缺陷的,有时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不恰当的,有时我们会受到自己思维定势的限制,有时我们会受到外部舆论或行政干预的过份导向或压力。因此,在个人的研究中产生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甚至一种错误认识在整个学术界中成为一个时期的主流也是难免的。这时,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讨论对科学研究发展总是有利的。在学术交流中,还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观点,因为少数人的观点转变为主流观点往往正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执这种观点,而是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和事实根据。

开展学术活动 促进学术繁荣

——写在人口学会会刊《人口研究》成立 30 周年之际

张敏才(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

《人口研究》创刊 30 周年了,岁月匆匆,不知不觉进入了“而立”之年,有幸看到《人口研究》创刊、成长,成为中国期刊方阵期刊、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我在中国人口学会秘书处工作期间,《人口研究》作为中国人口学会会刊,为繁荣学术活动、推动学术创新、加强学会建设发挥了她应有的作用,我对《人口研究》更多了一分感激之情。

正如人生到了而立之年一样,《人口研究》经过了 30 年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个性:

首先,她是一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口学期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着办刊的宗旨和方

由于育龄妇女孩次结构的影响,递进生育率计算值有可能与 TFR 计算值存在显著差别。它与常规 TFR 之间的差代表着本时期婚育年龄变化的影响。

向,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取向,团结和凝聚着广大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这一条是根本,最为重要。有了这一条,就能背靠祖国,面向人民,与祖国共悲欢,与时代同进步。

第二,她是以研究人口、促进人口科学研究、繁荣人口学术为中心内容的刊物,30年来从来没有跑题。经得起诱惑,受得住冷落,始终不渝地坚守人口学研究和人口问题研究的阵地,给人口学者们提供发表研究成果、讨论人口与计划生育热点问题的平台。和自己拥有的作者群、读者群建立了相互信任、和谐相处的关系。老朋友更加熟悉,新朋友不断增加,刊物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人口研究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更加密不可分,更加相提并论,但人口发展在《人口研究》中的主流地位、基础性地位始终没有改变,说白了,这份刊物从内容到形式始终是属于人口学界的。当然,《人口研究》也不是就人口论人口,而是把人口问题放在国家、社会发展全局中来研究,来探索,来讨论。形成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容中外的格局,视野更加宽阔,内容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新颖。

第三,她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刊物。《人口研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对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学术流派,博采广纳,兼容并蓄,兼容多样,尊重差异。有时把争鸣的两种意见同时刊登,让读者自己去分析,自己去判断。对期刊来稿采用匿名评审,择优选用,为年轻学者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生态。我不是说这些都已经做到完美,至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了,有了正确的方向,就可期待有健康的发展。

作为中国人口学会会刊,《人口研究》对学会学术活动的繁荣一直以来都是有帮助,有促进,有贡献的,我在这里也顺便谈谈中国人口学会在开展学术活动,促进学术繁荣方面的一些情况:

学会的生命力在于繁荣学术活动。第六届理事会产生以来,一直千方百计争取资源,开展多种学术活动。几年来,共主办和联合主办学术活动30次,收到研讨论文共2600多篇,有些论文在《人口研究》上陆续发表。而且,每位理事都可选择参加各项学术活动,每个会员都有展示自己研究成果的机会。中国人口学会开展学术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选题得当。每次选定的研讨主题总是围绕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围绕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前沿问题。如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人口学会紧跟着筹备召开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人口学会立即根据统筹区域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组织召开了中国区域人口与发展研讨会;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人口与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学会又积极筹备召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人口流动学术研讨会。二是形式多样。中国人口学会开展的学术活动中,有学会独家主办的,也有和地方联合办的,如中国人口学会分别与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有关司以及吉林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湖北省、湖南省、甘肃省等省市人口计生委、人口学会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也有和高校联合举办的,如中国人口学会和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人口所联合举办的全国学术活动;还有和香港、澳门、台湾人口学者轮流举办的海峡两岸人口论坛,充分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吸取多方面的财力、人力和智力资源,共同开展活动。三是准备充分。每次活动,学会领导都精心策划,认真准备:选定会议主题后,反复研究,围绕主题列出若干子课题,提前下发预备通知,并通过报纸、杂志和人口网广为传播,广泛征集论文;对有的问题,学会组织专家组,进行实地调研,写出调研报告;除了广泛征集论文外,还约请该领域资深学者重点准备,或担任专题主持人;研讨会上人人发言,专题主持人汇集各家之见,把创新思维和主要论点带到大会,使与会者感到参加中国人口学会的学术活动有内容、有创新、有提高、有收获。四是保障有力。由于得到地方和高校

的大力支持,每次学术活动保障工作十分有力。中国人口学会与吉林大学共同举办了两次学术活动,吉林大学先后筹资 30 万元和 50 万元,经费保障为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和丰硕成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中国人口学会与上海市人口计生委等单位共同筹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人口计生委等单位筹资提供后勤保障和会后出版经费的需要,中外来宾对上海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和良好的学术氛围留下了深刻印象。

人口学会作为学术团体,从国家和社会需要以及学科建设发展的方向出发,大力推进人口科学的理论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办会方向,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不为营私谋利的项目所诱惑,聚精会神搞研究,一心一意图创新,才能不断地出成果、出人才,把人口学会办成创新型学会,人口学会的价值才能得到学者的承认、社会的承认、党政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承认,从而得到各方面更大的关怀与支持。学会是社团组织,属自收自支单位,如果光等着国家拨钱来办事,往往举步维艰,难有所为。学会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努力突出民间组织特色,办事机构不占正式编制,努力减少自身开支,不要国家负担;向国家申请到的研究经费主要用于课题研究和举办活动。通过横向、纵向的联系争取支持,我们采取学会拿一点,地方拿一点,学者们贡献一点,合作联手办会,实现双赢和多赢。我们常讲学会学会,由学者自己来办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学者把学会当成了学术之家,学者之家。对外联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强国际联系,中国人口学会和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人口学会许多会员同时是 IUSSP 的会员。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学会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地方相关部门共同举办过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扩大了我国人口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加强同港澳台人口学者的联系,中国人口学会成功地在昆明举办了第三届海峡两岸人口科学论坛,组织学者参加在香港举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人口科学论坛,交流了两岸四地的研究成果,密切了联系,加深了友谊,促进了合作,扩大了影响。学会领导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倡导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如学会召开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预测学术研讨会”,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会下遵守纪律,没有任何炒作。学会领导与会员、中国人口学会与地方人口学会,人口学会与国家人口计生委及各司、厅、局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和谐学会的气氛越来越浓。这里特别要提到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学会对中国人口学会给予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对会员登记积极进行宣传,主动协助;征集论文争先恐后,从不怠慢。

学会在多年工作中形成了六个方面的主要活动,逐步积累了经验,产生了影响,下一步要继续集中力量,办好这几件事,发挥品牌效应。这六项具有中国人口学会品牌效应的活动:一是已经举办了八次的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二是已经举办了三届的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奖,包括今年推出的全国优秀青年人口学者奖;三是已经举办四届的海峡两岸人口论坛;四是已经举办两届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前沿论坛”,以前中国人口学会与地方人口学会在调研基础上共同举办过多次专题研讨会,只是没有冠以“前沿论坛”的名义;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报告,现已完成总报告,两个分报告《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与政策选择》、《我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还有两个分报告《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研究》正在研究之中;六是各专业委员会不定期地提出学科发展报告,学会汇编成册以反映人口科学发展的全貌。以上六个方面的活动,集成六个品牌,形成品牌效应,就能使学会工作更加规范有序,显示更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我们希望,《人口研究》继续在协助学会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学术繁荣方面做出更大成绩。

(责任编辑:宋 严 沈 铭 收稿时间:2007-11)